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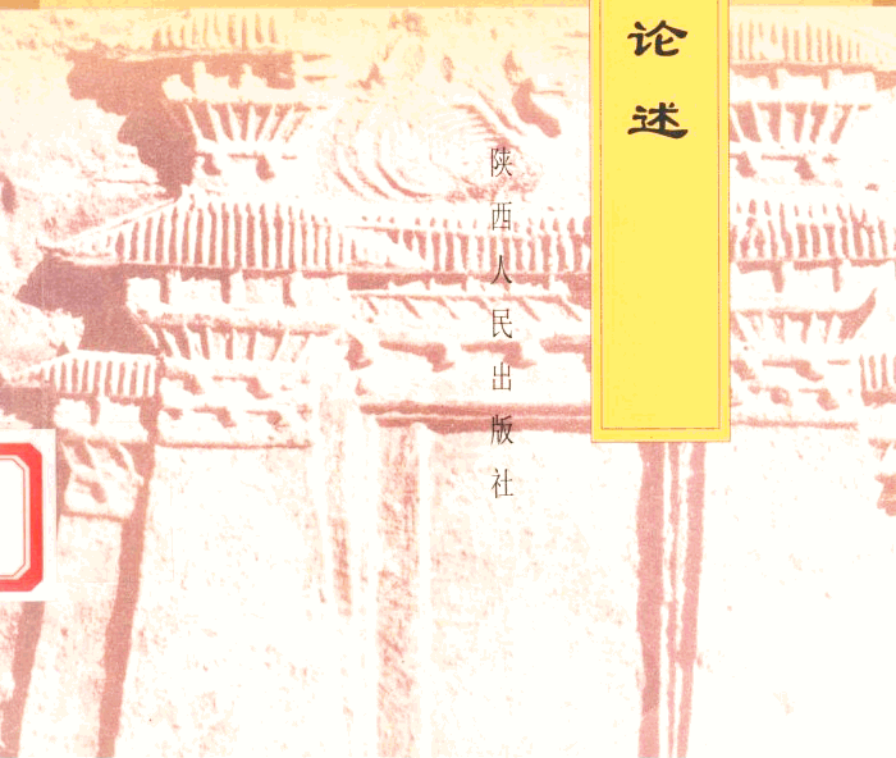
张岂之 主编

西部开发与人文学术丛书

贺麟学术思想论述

张茂泽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总 序

我们在古都西安筹划人文学术研究丛书事宜,正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和起动之际,这给我们以很大的鼓励,促进了人文学术研究丛书的组稿、改稿、定稿等一系列工作。这里所说“鼓励”并不是抽象的,而有着具体实在的思想内容。在我们的理解中,我国西部大开发,经济建设无疑应当是中心课题,而人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教育、文化、科学的开拓和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应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文化和科学中,研究“人”自身以及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人的思想、人的感情等等被称之为“人文科学”,即通常所说的文学、历史、哲学、语言、艺术等人文学科是不能忽视的,这些和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以及经济建设都有内在的紧密联系。道理显而易见: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由“人”创造的,因而对于“人”自身的研究,并使人在精神世界方面感到充实,具有高尚的理想和情趣,并遵奉道德规范等人文科学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了。

我国西部有不少优秀的人文学术研究者,就西北地区而言,他们大多集中在西安、兰州,而在敦煌、西宁、银川、乌鲁木齐等地也有人文学者群。西部地区的人文学术研究者基本是在高等学校的研究机构或文化、文物行政机构工作,他们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在敦煌学、历史地理学、中国思想史、周秦汉唐历史学、中国考古学、民族史、语言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其中有些已经出版,有些正准备出版。在这样的机缘中,我和一些年轻的人文学者决定组织编辑、出版西部开发人文学术研究丛书,拟分若干辑先后出版。其中既有与西部开发有关的

研究内容,也有没有直接关系而属于人文科学普遍问题的研究。总之,出版西部开发人文学术研究丛书是为了繁荣我国人文学术研究而贡献一点力量。

西部开发人文学术研究丛书的出版,得到陕西省人民政府和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支持,在这里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张岂之

2000年2月13日于

西安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形成发展过程	(5)
一、萌芽(1902 - 1931)	(5)
二、形成发展(1931 - 1963)	(11)
三、成熟(1963 - 1992)	(20)
第二章 心物关系论	(31)
一、心外无物	(31)
二、心物合一	(50)
三、矛盾及调解	(62)
第三章 心理关系论	(72)
一、心理关系概论	(73)
二、心即理	(80)
三、心与理一	(86)
第四章 逻辑主体论	(94)
一、渊源和特征	(95)
二、主体和客体	(102)
三、主体唯心论	(113)
四、戴面纱的“实践”	(129)
第五章 直觉方法论	(141)
一、直觉说的形成	(141)
二、直觉经验	(147)

三、直觉方法	(152)
四、理智直觉方法	(164)
五、直觉方法和逻辑方法	(171)
第六章 逻辑方法论	(182)
一、逻辑思想	(183)
二、方法的出发点	(188)
三、辩证法	(196)
四、本体论方法	(206)
五、心观法	(215)
第七章 文化哲学思想	(225)
一、本质批评法	(226)
二、文化精神“发现”法	(234)
三、文化比较方法	(244)
四、宗教精神	(254)
第八章 人学思想	(271)
一、意志自由	(272)
二、理想主义	(284)
三、人的使命	(289)
四、理想解释法	(296)
第九章 新儒学思想	(306)
一、学养方法	(307)
二、知行合一论	(320)
三、发展新儒学的主张	(330)
(一)“正宗哲学”说	(330)
(二)“三化”说	(335)
(三)“三合”说	(351)

结 语 抽象的主体·····	(362)
续 论 贺麟对唯心主义的批判·····	(374)

序 言

在 20 世纪 20—40 年代,中华大地,先后诞生了几个学术流派,出现了和传统知识分子迥然不同的学者群。论学术修养,他们大都中西兼通,古今咸备,堪称乾嘉以来,最具哲学和科学素养。他们的学术思想,一般而言,也多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欧美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试图现代化的产物,是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的“真理”,在理论形式上比较集中的表现。

他们当中的少数代表人物,被现在一些学者称为“现代新儒家”。其实,他们大都认为,内充实才能外光辉,强调提高人的内在的科学文化素养的重要性。这一思想,已经被今天的人们所继承发挥。祖国现代化建设成功的前提之一,就是必须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提高所有人的科学文化素质。这已越来越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但是,如何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并将它和现代化事业有机结合起来,在世界各地,人们相互之间,还有巨大分歧。对此,回顾这些学者在这方面的论述,对于进一步认识人类的思想实际,探索思维规律,缩小直到解决人与人、国与国、文化与文化间的各种分歧,是不无帮助的。

这一学者群,大都从事教育工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是他们会聚讲论的中心。他们的教育思想、教育活动,对中国建立和发展现代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而广

泛的影响。这些影响,至今仍然存在。随着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教育方针、办学宗旨、教育制度等方面,这些影响,看来还会继续下去。但学术界对这些影响的研究和评估,还远为不够,这是我们应该感到愧对他们的地方。

这些学者,已不再是传统知识分子那种各学科兼备的通才。他们各有专攻,近似专家,所以相互之间,难免见解差异。在政治上,他们的立场、观点互有不同,对近代历史上蓬勃的革命运动,或褒扬,或贬责,或亲身参与,或热切注视,都不漠然忽略,冷眼以待。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希望,希望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富乐安康,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要运用自己所学,酬劳桑梓,报效祖国,为民族的独立解放事业,为祖国的现代化事业,尽自己的力量。他们大都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自己所从事的学术教育事业。这一点,很值得我们今天好好学习。

可喜的是,在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正把他们的目光,投入到这一学者群身上。国外,以美国学者费正清、费惟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为代表,对这一学者群进行了宏观的研究。此外,美国、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有不少学者,在进行专门的研究工作,还有一些学者,则或多或少涉及到这一学者群中某些个别人物、思想时,进行简要论述和批评。比较起来,国内学者对这一学者中的人物、思想的研究成果,却随处多多,且论述专门、集中。或从历史角度,或从哲学史、思想史角度进行研究,或研究个别人物、专门问题,或研究某一学派,集中论述,付出了大量心血,取得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成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方克立、李锦全二位先生,组织一批学者,发挥集体优势,有计划地攻克“现代新儒学”这一课题,一方面出版研究论文集,一方面出版“现代新儒家研究丛书”,取得显著成绩,推动了对这

批学者及其思想的研究工作的开展和进步。

在这一学者群中,和对其他学者的研究成绩相比,对贺麟的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相对薄弱一些。较全面地、系统地研究贺麟的学术思想的成果,尚未得见,这是一个不足。

贺麟先生,也是这一学者群中的一位代表。他以文集《近代唯心论简释》为代表作,揭起了被称为“新心学”的学术旗帜。他学术思想的形成,比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诸先生晚一些。这使他有批评总结中国近代以来的学术成绩,为自己的学术思想奠定近代学术史基础。富有历史性,是他的思想特色。他的学术思想,有体系,包容了中西方许多学者的思想言论在内。中西古今融会贯通,是他学术思想诞生的路径,也是他学术思想本身的特点。他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有比较深入而独到的论述。这些论述,以他的逻辑主体论、逻辑的直觉方法论为基础,形成了他的以文化哲学方法论为重心的文化哲学思想。他的新儒学思想,正是他的文化哲学思想的直接表现。另一方面,他学术思想的产生,又是他融合中西文化、贯通古今文化的学术实践的结果。所以,贺麟的学术思想,也可说是他对自己的学术文化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我们今天研究他的学术思想,明了其特征,对于我们认识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历史实际,十分必要。而他的学术思想本身,对我们今天开展学术事业,也有积极意义。他的思想,特别高扬人的主体性,强调人的认识的辩证性,认为真理是真理自身的标准,也是谬误的标准等,都足以启人心智,发人深思。他的学术思想体系,有成功处,有不足处。他融会贯通古今中西文化的工作,有经验,也有教训。这些,都值得我们好好总结。

贺麟先生的学术思想,渊源于中国哲学,又渊源于西方哲

学,涉及到的中西古今学者很多,研究他和这些学者之间的思想关系,工作浩繁。由于笔者读书不广,年轻识浅,全面系统地论述清楚他的学术思想,实心有余而力有所未逮。所以,将文章题目冠以“述论”,表明我将以述为主,以论为辅。以述为主,着重将他的学术思想体系的本来面目,尽可能地如实描述出来。以论为辅,根据我所描述的他的思想内容,略加点评。

贺麟先生不在,我的描述是否如实,谁知道?他的著述在,天下学者知道。贺麟学术素养甚高,我的学术素养很低,以低水平论断高水平,便如同以浅见评深识,以幼儿孺子论大学者,难免见其表而略其本,得其粗而遗其精,是以不敢放言高论,只能略做点评。幸好贺麟先生相信,“东圣西圣,心同理同”,圣贤愚不肖,愚夫愚妇,村野小儿,都有纯洁的心灵、伟大的真理。既如此,即有点评不当,即使他亲在,也必不骂我放肆。况且,他本就宅心仁厚,待后进特别慈祥热情呢!

虽然如此,仍然要以述为先,为的是不致误解,误解他的苦心孤诣之所在、真正意义之所指;仍要以论为后,为的是尤其不敢把自己的误解,从我这里,强加给他,当作他的思想真实,然后批评之,论断之,使误解更深更固。即使有批评,有论断,也只是他学术思想固有优势的显示,本来矛盾的暴露。论他的思想,只是他的思想自论。这时,论便是述,是述的表现;述也是论,是论的本质。是谓“述而不作”,也可谓“述即是作”。

这是我的追求!

是为序。

第一章

形成发展过程

一、萌 芽

(1902 - 1931)

贺麟(1902 - 1991),字自昭,四川金堂人,1917年,入成都石室中学学习。1919年,考入清华学校中等科二年级,1926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同年,赴美,在奥柏林大学,学习拉丁文、德文、心理学、哲学史、伦理学、宗教哲学、圣经等课程。1928年2月,转入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学习摩尔、西吉微克、格林三人的现代伦理学、19世纪哲学、政治哲学等专题课。由于参加纪念斯宾诺莎逝世250周年的读书会,他“爱上了斯宾诺莎哲学”。暑期,著《格林》文,对新黑格尔主义者格林的为人和他的哲学、政治思想推崇备至。

因为当时芝加哥大学的课堂上,偶尔出现“空谈经验的实用主义者”,贺对之不满意,为了进一步学习西方古典哲学,1928年9月,转入哈佛大学。在那里,他听了康德哲学、斯宾诺莎哲

学专题课。同时,自己课下阅读美国新黑格尔主义领袖鲁一士所著《近代唯心论演讲集》《近代哲学的精神》等书和讲稿,以此理解黑格尔哲学的真谛。

在美国的科学和哲学学习,为贺麟打开了创立“新心学”的大门。他的学术思想开始萌芽了。他在去德国前,制订了一个长远的学术计划。其中,有这样几项和后来的“新心学”有直接的关系:

(一)思想方法兼用直觉及矛盾思辨法;

(二)融会西洋的唯心论和中国的理学,以完成自己的合诗教、礼教、理学为一炉的学说;

(三)翻译、介绍、研究斯宾诺莎哲学、德国自康德到黑格尔的古典哲学,以及新黑格尔主义;

(四)研究宋明理学,特别是朱子的学说,并研究道家学说^①。

这一计划表明了他以后治学,要采用的方法和要走的路径——中西融会的学术道路。这条道路,又清楚地显示了他的学术思想的两大渊源。

其一是中国哲学。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中介。1920年春,梁启超应聘到清华讲国学小史,也讲中国文学、王阳明哲学。贺听他讲课,很受影响。去拜访梁启超,梁要他读戴震的书,又借焦循的文集给他阅读。贺读后,写了《戴东原研究指南》《博大精深焦理堂》二文。梁漱溟也曾往清华讲演过,贺也拜访他几次。二梁都推重王阳明,贺深受影响。不过,贺对程朱理学也很感兴趣。他的眼光不局限于一派一家,还在少年时,他就立大志,要“读世界上最好的书,以古人为友,领会最好的思想”^②。所以,我猜测他出国前,不只对儒家的理学,而且对道家的老庄,

也有领会。因此,在哈佛,当怀特海对贺麟说他喜欢中国人的天道观念时,贺即问,“你说的天道观念是儒家的还是道家的?”怀特海是本世纪上半叶的“哲学大师”^③,却自称“喜欢东方思想”,喜欢中国人天道观念,对贺立志研究中学,为中学开辟出路,也当有影响。

其二是西方哲学、西方文化。西学对中国的影响可上溯到明代,蔚为社会风气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当时,清华同学大都准备出洋留学,以至轻视国学。梁启超在光绪朝即以言西法名世,他主张学习西方,引入西方文化、哲学,并大力宣传西学,如尊康德是“万世之师”,“暗黑时代之救世主”。梁是康德哲学在华最早的传播者。不过,于贺接上西学渊源更有助力的,是吴宓。1924年,《学衡》杂志主编吴宓到清华任国学研究所主任,聘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导师。他首次开出“翻译”课程,讲解翻译原理和技巧,并辅导翻译练习。贺麟、张荫麟、陈铨三人就学之,时人称为吴门“三杰”。1925年,贺写《论严复的翻译》,是严复去世后第一篇讨论其翻译的文章。这也预示着贺将像吴宓介绍西方古典文学一样,走介绍西方古典哲学的路。

在留学期间,导引贺进入西方古典哲学殿堂的代表性学者,一是美国的鲁一士,如前述。二是德国的哈特曼。1930年夏,贺麟从美国到德国,入柏林大学学习。其中,哈特曼所著的《德国唯心论哲学》《伦理学》,对他影响很大。哈特曼,和鲁一士一样,都是著名的新黑格尔主义代表。新黑格尔主义,是贺麟进入德国古典哲学的门槛。而斯宾诺莎和康德,如贺后来所说的,则是他进入德国古典哲学的桥梁。

从贺麟的两大学术渊源可以看出,他的学术思想萌芽,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贺麟学术思想萌芽,尤得力于他在留学期间,受到了近代科学研究方法和逻辑思维方法的系统训练。他在美国的最初两年,主要学习的是生理学、心理学、人类学,还写了一些读书报告。这些报告,比较注意材料的搜集、分析、归纳和概括,寻求事实的因果必然性,其科学性甚明。而逻辑思维的训练,则是在许多老师指导下,由他自己阅读逻辑学和哲学著作获得的。布拉德雷《逻辑原理》,对他恐有很大帮助。在哈佛,讲授康德哲学的是路易斯教授,他头脑非常清楚,要求学生很严格。他让每位同学一周读康德著作 50 页,两周交一次读书报告。康德的哲学著作,文字晦涩,十分难读。但在艰苦努力下,一年下来,贺竟读完了《纯粹理性批判》大部分、《实践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学基础》《未来形而上学导言》,读书报告也积累了一二百页。从此以后,他阅读哲学著作,如朱熹的文集,便觉十分容易,且兴味盎然,思考问题,也清晰有条理了。

第二,贺学术思想萌芽,根本上说,源于他独立思考,不为陈规所缚的创新精神。创新精神,在早年,体现在他立志高远,不满足于既得,要“领会最好的思想”;为实现这个目标,不断锻炼培养自己,坚贞不渝,不屈不挠,“动天地,泣鬼神”的至诚追求精神;还体现为他不为学派所限,意欲会合诸家,共治一炉的开阔眼光和胸襟;体现为他不为课堂学习所限,进行大量的课外学习,自学自己感兴趣的哲学著作,和良师益友促膝讨论,收获远远大于课堂所得。

第三,中学、西学,包括的内容众多。贺麟的“新心学”对之有“正宗哲学”的划定。在这时,他对中学西学的理解,已表现出“正宗哲学”的轮廓。他所谓中学,指宋明理学,特别是程朱陆王,此外还加上道家学说。其中,理学是主,道家是从。他所谓

西学,指德国古典哲学和斯宾诺莎,外加新黑格尔主义。将中学加上孔孟,将西学加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再去掉新黑格尔主义,就是“正宗哲学”。这也是我断定他的学术思想萌芽于1931年以前的原因。因为,他一旦找到了“正宗”,就找到了学统,找到了自己学术思想的血脉,起点和归宿、方向和规范、理想和方法,均可从中自然生长出来。

这里有一个问题。一方面,他的思想有“正宗”,另一方面,他思想的动力在创新,在于不为一家一派所限制。这就让人关心,他的“正宗”会成为拦住创新的墙吗?或者他的创新,能否突破“正宗”的限制,成为正宗的创新,创新的正宗,则这时的“正宗”,已不再是某一思想流派的代名词,而是人类认识逼近绝对真理的历程呢?在当时,他还来不及回答这一问题。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寻找一种能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的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的哲学,同时这种哲学还能解决古今中西文化之争,能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等等。而新黑格尔主义,在贺看来,就比实用主义更能满足这些需要。

在美国,贺面对着两大哲学流派的两位代表人物,一是詹姆士,一是鲁一士。他对二人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对勘比较,结果选择了新黑格尔主义在美国的“柱石”^④——鲁一士。这是因为,他认为,鲁一士哲学有体系,逻辑严密;有方法,有历史方法,辩证方法;有理想;强调团体、社会;关注东西方文化“相类似”处;要求哲学与科学相融洽等^⑤。他结论说:

整个讲来,鲁一士是一个伟大的导师,他的哲学很少难题。如果积极民主是我们所最需要的,那么,鲁一士的道德哲学和社会哲学则明确地指出了通向积极民主的道路,且避开了孤立个人的个人主义。如果宗教

与科学调和是当今的急迫问题的话,那么鲁一士的宗教思想实在能帮助做这种调和。如果当今世界,东方哲学和西方思想应该融合的话,那么可以产生一种世界新文明的这种结合或综合的形式,我认为首推鲁一士所陈述的唯心主义的形式,它最适合充作使东西方思想结合为一个和谐整体的中介人。这不仅有利于世界文明,而且也有利于世界和平^⑥。

这段话充分表明,早在1929年于哈佛时,他就对美国的新黑格尔主义推崇备至了。这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是一个关键的转折。从此以后,他便进入哲学王国,“新心学”思想找到了自己的起点。

从他后来形成的“新心学”思想看,贺麟继承了新黑格尔主义追求自由的理想和方法,也继承了这个思潮的代表人物们比较关注的问题,如唯心主义,科学和宗教、道德的关系,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等文化、哲学、人的问题,而且还继承了这些学者解决上述问题的倾向性,如“以内心的未来生活为现实”^⑦的理想主义倾向,反对外在压迫而重内心生活,反对功利主义而重精神追求,反对享乐主义而重内在超越等倾向。

但是,他并没有以此自足,成为一个新黑格尔主义的“应声虫”。而是围绕民主、科学、中西融合等问题,从奥柏林到芝加哥、哈佛、柏林、北京以至昆明,从格林到鲁一士、哈特曼、斯宾诺莎、康德以至黑格尔,学术思想在创新中不断深入,不断超越。在本体论方面,唯心主义以逻辑心即理命题表现出来;方法论上,使直觉逻辑化,建立了逻辑的直觉方法;文化哲学方面,对古今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尤为关注;至于新儒学,就是传统儒学的现代化。贺的宗旨在于,把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各自连成一

线,相互打成一片,以为近代中国的到来提供理论基础。可见,他继承新黑格尔主义的同时,又有改造,有发展。他的“新心学”,已不再是旧的新黑格尔主义如鲁一士、格林、哈特曼等学者的学说在中国的延伸。如果一定要说它还是新黑格尔主义,那么,贺的新黑格尔主义,已是旧的新黑格尔主义的新发展的中国化。他的学说更有辩证性,他的“新心学”,是中国近代哲学的一部分,而不是在中国的西方哲学。

二、形成发展

(1931 - 1963)

1931年,贺麟先生回国。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明年,升副教授。讲授课程有哲学问题、西洋哲学史、西方现代哲学、伦理学、斯宾诺莎哲学等课程。回国前制订的学术计划,结合教学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民族危机加深,却常常牵动着他们平静的校园生活。九一八事变发生,他奋笔写下《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初步表现了他准备用学术文化救国,改造和振兴民族精神的追求。1937年,抗战爆发,贺也随北大辗转南下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贺麟加快了他学术思想体系建设的步伐。他花费较多精力,讨论现实的抗战建国、现代化以及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这些讨论,为他思想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有力支持,是他学术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1942年,他的第一部论文集《近代唯心论简释》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标志着贺麟的学术思想体系正式形成,“新心学”建立了。他在西方求学数载,回国又苦思力索十年,为解决民族国